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

价值的中间物

Jiazhi De Zhongjianwu

论鲁迅生存叙事的政治修辞

何 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

价值的中间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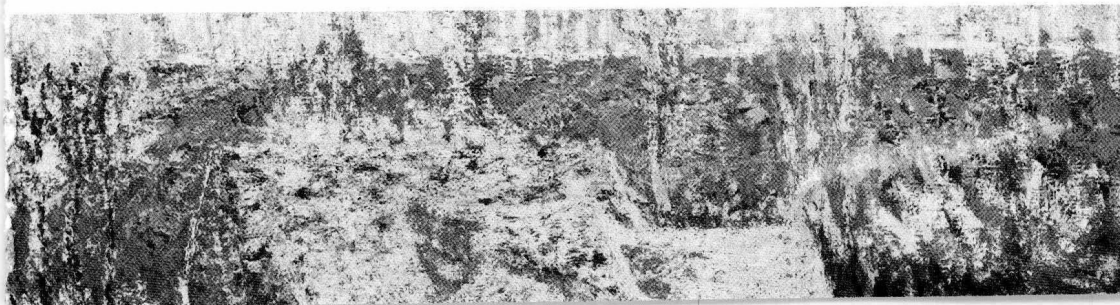
Jiazhi De Zhongjianwu

论鲁迅生存叙事的政治修辞

何 浩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价值的中间物:论鲁迅生存叙事的政治修辞/何浩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

ISBN 978-7-301-15511-0

I. 价… II. 何… III. ①鲁迅著作-文学研究②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10.97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1185 号

书 名:价值的中间物——论鲁迅生存叙事的政治修辞

著作责任者:何 浩 著

责任编辑:任 慧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5511-0/I·2128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5.5 印张 238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编委会

主编 王一川

编委 胡继华 周志强 刘莉 何浩 石天强 梁刚 胡疆锋



序 通向进化知识型的深层

如今怎样才有资格研究鲁迅呢？当鲁迅被一代代研究者如李长之、李何林、唐弢、陈涌、王富仁、王晓明、钱理群、汪晖、郅元宝、竹内好等中外学者作过一次次成功的阐释后，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面对已同时成为鲁迅新阐释的路灯与警告牌的鲁迅研究名著丛林，你还能顺利跨越它们而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吗？当何浩在 2002 年提出向鲁迅发动新阐释时，我当即就直言不讳地对他发出了如上质疑。我想他如果只是逞一时之勇，定会被“吓”退的。但他却选择了坚持己见，执意要去找他确信应当如此的“真”鲁迅。看来他当真了。

我对何浩是有了解的。这位来自重庆、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颇有人缘的俊秀小伙，十年前之所以离开稳定的山东黄海渔政岗位而报考北师大硕士生，内心涌动的就该是颇有些纯粹而执著的学术情怀。我至今清晰地记得他在电话里向我恳求跟我学文艺美学时的情形。尽管那时我们还没见过面，但我还是凭借他的成绩和令我心动的一心问学的诚恳的声音，“冒险”选择了扩招他，而那年我本来是打算不再扩招的，因为此前已录取分数排列他前面的三人了。有必要再去扩招你并不了解的学生吗？单凭他那诚恳的学术的声音！我那年确实这样做了。何浩随后就用他本人来证明了我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仅用学业的优秀，而且也以为人的口碑。顺理成章地，他硕士毕业后留下来继续攻博。何浩该是这样一种人：随和、诚实甚至是乖孩子，但这样的纯净憨厚外表下却活跃着一颗孤傲的心灵。你感觉他离你很近时，却又很远；而离你很远时，却仿佛又更近了。近而远，远而近，近与远就这样构成了一种辩证的交融。一颗纯净而孤傲的心灵，想必尤其能够感应鲁迅一类伟大而孤独心灵的颤动并与之对话吧？考虑到他前期准备充分，而且信心充足，我自然支持他做下去，当然也同时悬着一颗心，不

知他到底能做到哪一步。好在他总算按时做出来了。当时看完书稿后,我才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这部书的写作时间远比预想的要长。何浩虽然仅用三年就写出这部鲁迅“中间物”新论的初稿,但随后的陆续修改却花费了更长的时间。他的新颖而颇具理解难度的研究,幸运地受到童庆炳先生、程正民先生、李春青先生等的肯定和支持,从而顺利取得文艺学博士学位。随即,他也同样幸运地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党圣元先生、高建平先生、钱竞先生等相中,成了这个学术重镇里的助理研究员。何浩自己从美国著名的波士顿学院争取到做博士后的机会,去那里度过了半年多,真切领略到学术前沿的风景,做冷寂学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而对当今学界那些急功近利的事情,何浩采取的当是这种态度:非不能也,乃不为也。博士毕业三年多以来,何浩一直在对这部书稿进行修改、打磨,直到现在才成书。在今天这个功利学术成风的年代,这种甘愿做冷寂学术的文人习性和操守,不由不令人加倍敬重和珍惜。

何浩在这部书里,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进入鲁迅:重新辨析鲁迅提出的有名的“中间物”命题,以此为基础,紧密围绕鲁迅为了启蒙大众而展开“求真”活动的“世俗”的“拯救”过程,发掘出缠绕其间的真与善、堕落与拯救、决战与绝望三重矛盾,深入叩探鲁迅思想中的隐秘困境,最后引导到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重新审视以及对我们当下生存处境的重新观照上。这样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在鲁迅研究领域是新颖的和大胆的,具有开拓性,也有风险,我想这正是这部书的独特学术价值之所在。

何浩的鲁迅研究的真正重心,在于考察这种“中间物”如何对堕落的世俗生命展开拯救活动以及这些革命活动如何伴随无法摆脱的复杂矛盾和困境。何浩首先语出惊人地对一个微妙而又重要的问题展开了辨析:这些矛盾不是如之前学者所认为的那样由“中间物”的“中间性”、“有限性”或“过渡性”引起,而是围绕“中间物”教育大众“求真”的世俗化拯救行为展开。也就是说,学者本来认为世俗的革命活动所遭遇的种种矛盾和困境,恰是由“中间物”的“中间性”、“有限性”或“过渡性”本身所引发的;而何浩却标新立异地端出一种新见解:问题其实出在“中间物”偏要对大众展开“求真”的世俗拯救行动上。我认为这个判断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可以给鲁迅阐释带

来新鲜独到而又深刻的东西。

这部书在表述上有时难免艰涩,这样会给读者带来理解的难度甚至障碍(但愿他今后能表述得更浅易些)。不过,只要耐心坚持阅读和思考下去,我想总是能抓住要义的。我不知我是否有幸能有所收获。我想,何浩理解的“中间物”,好比就是鲁迅在浩瀚无垠的人生探究之旅中向尘世大众释放出的一个试探性气球。这个气球的任务,就是把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精英发现的“真的人”这一崭新的现代性命题,投入大众的世俗生活中,在大众和精英自己的生活中掀起一场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这个气球立即照见了以“仁义道德”为根基的传统人生价值体系的虚伪和衰败,显示了以“求真”为标准的堕落中的世俗拯救的必然性;另一方面,这个气球本身也暴露出自身的单纯性和易脆性,由此而引发出以“求真”为宗旨的世俗拯救活动中大众和知识分子自身遭遇的种种困扰。此书侧重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来考察现代性危机。从根本上说,大众的道德伦理体系或生存视阈都是由知识分子提供的。当现代知识分子摧毁了作为大众的生存视阈基础的各种传统“偏见”后,大众的价值观却没有立即导向新的清晰而是发生了混乱,现代性危机随之产生。何浩的这一敏锐的问题意识的背后,主要正是要重新考察现代人对人之基质的新理解:正是五四知识分子提出了“真的人”的命题并教育大众求真,才摧毁了大众借以生存的“仁义道德”为根基的传统价值体系,但却没有及时输入可供吸纳的新型人生价值标准,于是引发了一场危机。

这部书的总体框架,是从三个层面对“中间物”进行了新的阐释,令人耳目一新。第一层,“中间物”不是此前学者所认为的历史中间物,而是价值的中间物,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价值等级中的“进化中间物”。何浩给出的理由是,两者对人的基本生存语境有着不同的规定。此前的“历史”之说强调的是无等级差异的时间序列;而何浩的“进化”之说则强调了价值等级序列。将“中间物”理解为“历史”中间物,实际上摧垮了他战斗的动力机制。而只有把“中间物”放入生命秩序的价值进化序列中,他才具备进行战斗的无穷无尽的生发力量。换句话说,何浩认为,只是生命价值等级秩序的存在,才使得“中间物”在逻辑上成为可能,从而使得人之成为人。我认为这个区分是有其充分的合理性的,对于把握鲁迅对人之为人的基质的探究

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层,“中间物”不是空泛意义上的精神自由者,而是生命价值等级秩序的进化担当者。这一观察与学者们所理解的鲁迅所立之人颇为不同,因为精神自由无法说明过客为何总是选择出走。何浩从语义逻辑上论证说,我们可以说出走是为了精神自由,但不能说精神自由是为了出走。这种不同正是对人之基质的不同理解:出走是将人理解为生命价值等级秩序的进化担当者,理解为一个求真者。出走,就是为了精神不被世俗禁锢、不僵化。但此前学者则将人首先理解为空泛的精神自由者。这却不能生成为出走的力量,因为一个自由人为何必须要让自己受漂泊之苦呢?特别是当鲁迅考虑到中国在近现代的弱者处境,而将人的首要价值规定为自我保存时,更可能加剧大众苟活于世的偷生之念。

第三层,“中间物”身上的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对求真生活的无节制追求,而非有特定现实目标的世俗追求。“中间物”本身就意味着没有终止。对什么东西无终止呢?即对生命价值秩序进化的无终止追求。他总是撕裂一切社会伦理规则的边界,探究更好的人生、更真的生命存在。什么是真的人生?什么是生命的真状?这都是“中间物”拷问世间人事最常问的问题,特别是在《狂人日记》中。这种无节制的追问,使得鲁迅对未来“中间物”的想象挑剔得只剩下了儿童和无产者,因为只有他们才具备没有任何规定性从而充满无限可能性的存在者条件。如此,鲁迅在对传统和尘世充满失望之余而把仅存的希望寄托到“救救孩子”上,就变得容易理解了。

这三个层面的逐层叩问,把鲁迅“中间物”命题留给世人的非透明意蕴给剥露了出来,让其显示出迄今为止被隐藏着的一种深层内核来。我想这既是逻辑的力量、也是历史的力量所致,想必会重新引起人们对“中间物”的新体验和新兴味。我认为这正是这部书最富有学术价值的地方。对于说不完的鲁迅,何浩能向前多迈出一步,已殊为不易,值得向他表示祝贺。而按照我个人有关中国文化现代Ⅰ和现代Ⅱ之间关系的看法,何浩对于鲁迅的“价值”的“中间物”的新阐释,真正触及了中国现代Ⅰ所据以为基础的社会进化知识型的深层,而这种以时间上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为特征的社会进化知识型,同后来的也就是我们当前正生存于其中的现代Ⅱ所赖以支撑的空间共在知识型相比,有着显著的差异。置身于今天这个各民族共在的

全球化世界,而又能对鲁迅所代表的往昔社会进化知识型予以真切的体验和理解,这是重要的。在这点上说,何浩的研究对中国文化现代性和艺术现代性的阐释,应当都有着突出而深刻的意义。

至于何浩贡献的价值的中间物之说,是否就高于已有的历史的中间物之说,或者比后者更“真”,我对此的想法倒有所不同:旧说自有其以往的历史语境特性,也就是80年代鲁迅阐释特有的历史性,新说则必然打上21世纪初鲁迅阐释的历史语境特性,两说各有其生存的历史规定性和独特学术价值,不存在简单的以此代彼问题。

细心的读者想必会发现,这本书还包含另外一种意图,即把鲁迅“中间物”的精神品质放在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即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引发的价值危机这一问题意识框架中,从现代思想史语境出发去加以梳理和分析。这应是一项有着积极意义的工作。同时,何浩还流露出一种雄心:在修辞论美学基础上,提出一种强调辨析不同爱欲、重申价值等级秩序的政治修辞美学。就过去30年中国美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何浩的这种政治修辞美学应当有着重要的转向意义,有理由成为中国美学从疏离政治到重返政治的一个转折点。至于如何把新的理想化政治维度重新安置到人生价值体系中,应当是何浩这样的70后需要进一步面对的问题。尤其对于何浩这个特定的学人来说,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观察到人生价值的政治维度,比起亲身实践它来要容易得多。我希望何浩能直面挑战,在理论与实践上同时攻克这个难关。

当然,这部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方面。突出的问题就是前面提到的有时因表述艰涩而出现的阅读困扰,还有就是对唯一真答案的寻求定势。鲁迅在当时寻找唯一真答案自有其理由;但作为当今研究者的何浩,却需要立足研究者当前的语境并由此出发,对鲁迅当年的寻找行为提供一种清醒而合理的解答和反思。相信何浩可以继续问下去。这部书只是何浩的一次处子航,而我内心对他的期待更高远。

王一川

2009年2月17日序于北京林萃西里

目 录

序	通向进化知识型的深层	王一川 (1)
引 言		(1)
一	鲁迅研究综述	(1)
二	本书结构安排	(23)
第一章	一个比喻,哪种思想?	
	——论何谓“中间物”	(25)
一	进化中的价值中间物	(25)
二	反抗绝望与绝对命令	(35)
三	友/仇、人/兽、爱者/不爱者	
	——论《过客》	(38)
四	价值的中间物批判国民性	(50)
五	中间物的几个特征	(59)
第二章	真与善	
	——中间物的叙事伦理	(73)
一	中间物的真实人生	(74)
二	哪种善及谁之善	(80)
三	理智的真实与善的谎言	
	——重读《狂人日记》	(87)
第三章	吃饭与进化	
	——中间物行医崴了脚	(105)
一	吃饭与吃人和狼与人	(107)

二	身体与精神和药与疗救	(113)
第四章	堕落与拯救	
——	为了未来的中间物	(120)
一	堕落尘世	(121)
二	想象未来中间物	
——	无规定性与无限可能性	(126)
三	拯救,从家庭开始	
——	现代父与子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33)
第五章	中毒的中间物	
——	文化身份的世俗表述	(146)
一	文化身份难题	(146)
二	命定的中毒事件	(150)
三	一篇爱情小说、一个文化困境	
——	论《伤逝》	(160)
第六章	生命福音与现代困境	
——	中间物的世俗拯救	(169)
一	大时代与大决战	(170)
二	小杂感与时间的机缘化	(177)
三	拯救的福音与中间物的现代困境	(183)
结 语		(192)
一	价值的中间物与现代人形象	(193)
二	中间物的世界体验	(198)
三	中间物与“反抗”的文学	(201)
四	中间物与价值虚无	(208)
五	政治修辞美学:现代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生存叙事	(215)
参考书目		(225)
后 记		(236)

引言

一 鲁迅研究综述

鲁迅曾说,“忘记我,管自己生活”^①。如果从广义来理解鲁迅的“遗嘱”,那么,70多年的历史(1936—2009),我们都在背叛鲁迅。历史从未忘记过他。我们对鲁迅的谈论和阐释,超过了其他所有现代文学家。但背叛他,恰恰是为了我们自己。自己生活,当然意味着能自由地思想。我们所有思想的条件就是理智的交流以及心灵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碰撞。自由,需要我们与伟大心灵间的不断交流。为了自己生活,我们需要就一些我们关心的重大问题与鲁迅对话。我们倾听、沉思、辩驳。对于这个影响巨大的现代中国人,我们需要在聆听和沉思中,分辨他在哪些方面对我们现在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或控制、警示或提醒。当然,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前辈学人所已然阐释的诸多鲁迅形象。清理他们已经做过的工作,弄清他们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塑造着鲁迅,就成了本书首先面临的工作。

回顾70多年的鲁迅研究史,有许多现象值得我们去细致梳理和深刻反思。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大致有三种范式:政治革命范式、思想革命范式和主体意识范式。作为对政治革命研究范式的调整,思想革命研究范式强调鲁迅思想和文学世界相对于政治领域的独立性。这与当时学界强调文学自主性相互应和。主体意识研究范式则多从存在主义角度,认为思想革命范式忽视了个体的独立存在以及生存感受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还有研究者吸取西方后结构主义理论资源,认为鲁迅文学的主体书写是一种“反抗

① 鲁迅:《死》,《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12页。

被描写”的话语行为。

在过去的研究范式中,明显表现出对个体独立与文学自主性的重视,对自由平等意识的尊重,对权力话语的批判态度以及世俗中的末人意识、由此反映出来的现代性的危机。本书即尝试对上述研究范式中的理论话语和话语形态,进行深入的反思,并对当其研究的文化背景和理论支持进行梳理,为鲁迅研究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野。

个体独立与文学自主性

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鲁迅的政治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鲁迅研究的主要范式。研究者对此有诸多反思。比如王富仁认为,以陈涌为代表的政治革命范式,从政治革命角度对鲁迅前期小说的阐释,摆脱了当时鲁迅研究界大多尚停留于相对琐碎的、零散的单篇文章思想艺术分析,并渗透着研究者本人的审美感受。^① 杨义认为,“他以出色的理论思辨能力,系统地论证鲁迅作品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的形象把握,展示了鲁迅作品注意中心的农民问题以及知识分子的二重性问题,揭示它们与革命领袖的经典论述一脉相通之处。应该说,陈涌的论文代表了从政治视角研究鲁迅作品真实地反映历史重大问题的深刻性的学术史阶段”^②。研究者们较为公允的评价给予政治革命模式以应有的历史地位。由于当时文化语境的特殊作用,这种本来不乏独特与深刻的政治革命研究范式难免被推向独尊位置,使鲁迅作品中的其他丰富内涵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和阐释。由于它特定的政治视角,往往以政治革命理论涵盖了鲁迅文本中的其他丰富内容。比如《阿Q正传》(1921)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关于阿Q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就被大大强化了,成了《阿Q正传》之所以成为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标志;而在原作中用大量篇幅和主要笔墨加以表现的阿Q精神弱点的艺术描写,则无形中被降到了一个较次要的位置,并且常常被认为是鲁迅较多地看到人民的弱点的例证,作为鲁迅当时思想局限性

①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2页。

② 杨义:《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序言》,《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之所在。^①

文革结束后,鲁迅研究界开始对这种逐渐走向一定程度偏颇的政治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在80年代思想解放的背景下,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是鲁迅研究界新动向的代表作。他在对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明确区分中系统地构建起自成体系的研究范式。他认为,思想革命往往比政治革命更加漫长和艰巨。他说,如果鲁迅思想的伟大性只在于他比中国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都更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鲁迅小说的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它比任何一个中国作家的小说都全面深入地诠释和印证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理论,那么鲁迅及其小说也就丧失了独立的思想价值。

王富仁指出了政治革命研究范式的某些偏颇和不足,开拓出思想革命研究范式的逻辑起点。他认为,不应当以中国政治革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的某些结论来说明鲁迅小说的思想意义,而应当首先以鲁迅当时的实际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依据来发掘鲁迅小说的思想风貌。这里,要将鲁迅小说研究的政治革命角度和思想革命角度区分出来的问题意识非常明确。比如他认为,鲁迅没有承袭晚清谴责小说的传统,集中暴露官场的丑行和政治腐败,也没有像梁启超的政治小说那样重点宣传新的政治理想,而是主要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提出反封建问题。《狂人日记》(1918)对封建主义的批评,也不是集中于它的政权形式,不着眼于政治状况,而将重点放在这种制度赖以存在的思想支柱上。^② 自王富仁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对鲁迅小说的思想意义做了新的审视与思考之后,思想革命的内涵在学术界不断得以深化和拓展,远远超出反封建的层面。

王富仁后来反思,思想启蒙派对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区分,意在突出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和价值。独立,是这一时期鲁迅研究的重要意识。

研究者们强调,思想独立于政治,思想革命独立于政治革命。从事思想

① 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

② 同上书,第31页。

文化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不是仅仅为巩固现实政权服务,而是为了改变中华民族愚昧落后的文化状态、发展中华民族的现代科学文化事业。^①他们认为,不管当时具体的政治倾向性是什么,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仍在于他对改造国民性的重视以及他对中国各种文化现象的富有独创性的表现和解剖。

出于对学术研究中滥用政治标准的否定,研究者们倾向于弱化鲁迅作品的政治性,强调鲁迅的文学性、审美性以及思想文化的独立意义。鲁迅小说的政治特征日益被弱化为研究背景。如竹内好所说,“鲁迅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中国现代的代表性文学家。不过,那种政治性是由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政治性”^②。他认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正是不断产生作为政治启蒙者的鲁迅的终极场所。如同李欧梵为了区别于毛式英雄的神化鲁迅,而偏重挖掘鲁迅的文学艺术价值及其复杂思想一样^③,竹内好研究鲁迅的问题意识,同样来自于当年日本文学批评界存在的关于“文学与政治”对立与分离的讨论。他们都急于辨认鲁迅的文学身份有别于政治身份。而竹内好不仅仅限于辨认鲁迅的文学性,他还探讨了鲁迅文学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内在复杂关联。但他们的问题意识与王富仁一样,都来自于文学或思想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这种强调独立性的问题意识延伸到随后学界对鲁迅精神结构的探究,就有了主体意识研究范式的确立。

有研究者认为,主体意识研究对鲁迅精神结构的探寻是对思想启蒙派决定论思维的反拨。^④汪晖、王晓明、钱理群等都是这一研究路向的代表。比如,汪晖质疑说,王富仁的研究前提是:时代的思想革命运动决定了作家的意识倾向,作家的意识倾向决定了文本的本体意义、意识本质、创作方法、艺术观念以及技巧。显然,这种线性因果逻辑必然会省略、简化、删刈大量信息,凡是经验的、感性的、文化心理的等非意识本质的内容,就被排除在

①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4页。

② [日]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7页。

③ [美]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224页。

④ 汪晖:《反抗绝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9页。

外。由此,鲁迅对历史的“循环感”、“重复感”、“轮回感”就很难理解。^① 这些研究者吸收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角度探索鲁迅的精神世界,力图从鲁迅的内在精神结构进入鲁迅的文本世界。针对思想启蒙派的理性决定论,他们的鲁迅研究强调偶然、情绪、无意识等等。特别是汪晖,他深入挖掘鲁迅复杂的精神结构,从存在主义考究鲁迅的现代生存体验,凸显了《野草》的重要意义。他把“历史中间物”作为鲁迅精神的核心意识,并将“反抗绝望”作为这一中间物走出自我、超越自我的绝对命令。他的敏锐洞察使得学界对鲁迅的理解深化了许多。

这看似反拨的研究维度,仍是思想启蒙派研究路向的延续。在他们的研究中,政治与思想文化这种二元对立杠杆没有变化,这次不过把对立的两极变成了政治与个体存在。政治归国家,而思想、存在则属于非政治化的市民社会领域中的个体。个体,首先是一独立的生命存在体,他可以独立于政治领域,徜徉于思想理念、文化审美、生命体验的安全地带。他甚至不从属于家庭、社会、历史、民族、国家。他首要的存在维度只是生与死,这是人作为生物体的基本机能。对个体的任何政治化阐释或规范都是第二性的、从属性的。王富仁认为,思想文化事业是永恒的,政治革命是短暂的。^② 思想文化是可以独立于政治领域的。当然我们还有些疑惑,为何某一时段的思想文化事业不是在为人类无休止的政治革命做准备? 鲁迅说:“强谓之平和者,不过战事方已或未始之时”^③。汪晖认为,鲁迅文化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起点是对生命个体的思考。^④ 如果说思想文化仍是公共领域中的重要内容的话,那么,个体的生命存在就彻底是私人领域中的自我选择。没有比个体的生命存在具有更广泛、普遍,然而也更抽象的独立性了。在追求个体的独立性上,他们比王富仁扎入得更基本,却未必更开阔。他们把这种独立性建立在个体生命的不可重复之上。他们认为,这种私人领域是所有公

① 汪晖、钱理群等:《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论鲁迅(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29—332页。

②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

③ 鲁迅:《摩罗诗力说》,见《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④ 汪晖:《反抗绝望》,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页。

共领域的价值和意义基础。个体的生命存在是整个社会、国家以及世界的意义根基。所有价值意义都是人“向死而生”之后的自由选择,所有的价值意义都没有了必然性,唯一的必然性是人的必死性和有限性。人必有一死。现代人首先体验到的,是存在的悲凉、有限、孤独、惶惑、危机与绝望。正是基于这些现代生存体验,研究者们以《野草》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存在主义式的鲁迅形象——历史中间物。这一形象的基础,正在于对个体的不同理解:人,首先是一独立的生命体。由此,他们对鲁迅的关注不再侧重思想或政治层面。

在他们的鲁迅研究中,理性与非理性、决定论与非决定论这些区别于思想启蒙派的特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问题意识:使独立的个体脱离一切束缚,将个体生命与政治、国家等进行更进一步的区分,进而伸张和维护文学的自主性,并在话语形态上构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峙。个体一无所有,只是一个无任何规定性的生命体。他们突出生命的有限与不可重复对于个体存在的基本性,从而贬斥并控诉政治斗争的虚伪、污浊、冷酷。汪晖博士论文的出版,或许在强化人们普遍渴望遁入市民社会的心灰意冷,并越来越把鲁迅研究纳入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话语结构之中,起着相当作用。

进一步说,鲁迅研究中的这种“独立”叙事其实是与80年代整个“文学自主性”思潮相应和。文学自主性得以产生意义的话语场,则是文学与政治对立的二元结构。这种思潮以一篇题为《论文学的主体性》的文章为代表。^①该文标举以下观点:人是文学活动各个环节的中心和目的,人的主体价值,主体力量,主体地位才是文学应该关心的重点。著者受李泽厚的“主体性”概念的影响,将其运用于文学研究领域,提出著名的“文学主体论”。他所理解的主体性,主要指按照人的主观意愿“自由”地、具有“创造性”地创造和表达自己,独立于任何外在的限制。主体的这种自由、能动精神在文学自主性浪潮中得到极大张扬。这样的“主体”是一个绝对的主体,是一个自我创造的主体。这些被众多研究者们不断反思的文学主体性、自主性观念在当时有某种令人惊异的效果。由于它对之前几十年的“文学政治论”、“机械反映论”构成了巨大冲击,并响应着80年代早期复兴的“文学是人

①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